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七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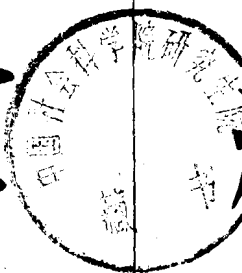
據民國十六年榮璋編影印

山西省

合河政紀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670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八月臺一版

合河政紀

全冊

定價：新台幣二四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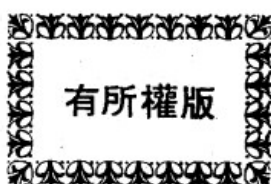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李馬奔 (Linaha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合河政紀

范源泰



甲戌春三月陽新
石氏蓉城仙館印行

合河政紀序

牧令爲親民之官漢法三年大計徵其卓異入官侍從明仿漢制州縣報最內遷台諫故二代牧令誅鉏奸暴克舉其職吏治稱爲史冊之冠滿清入關慮州縣權重守道藩臬益以督撫層層監察縛束馳驟一如轅下之駒吏之負才武而懷忠鯁者跬步必躓脂韋梯突之流相率而稱幹吏焉宜其吏治之衰荼勿振也民國改元去督撫臬府易藩司爲省長其下獨保道區令之懷才負異者宜可表見於一時而十稔以來南北構釁兵亂相尋非軍閥卵翼幾無過問政治之餘地唯山右一省保境息民禍亂不生而吏治蒸蒸論者謂爲今日神州唯一完善之區非虛語也吾友陽新石大令蓋年於民國五年間出宰興邑其政通其人和其應興應革之利弊罔勿釐剔而規圖之既去官

慮良法之難於久而勿失也編爲合河政紀二卷以詗當世之從政其用心民事可謂至勤且遠矣辛酉夏秋余與大令同客京邸朝夕槃談過從甚歡間出是編相視并屬弁言卷首余歸農久矣對於政治若村夫之語五都何能爲蓋公致一詞顧以蓋公慤懃誼諉又不可以謗陋遽卻其意乃爲書其端概於此噫安得中國今日廿餘行省盡如閩督之於山西又安得廿餘行省千七百州縣官盡如蓋公之於興邑耶爲之拊卷慨然矣民國十年仲冬月下浣辰陽廖名縉敘於京西香山靜宜園之半山亭

合河政紀序

昔者孔門設教分爲四科曰德行曰言語曰政事曰文學蓋以秉性各有專長因其所長從而陶鎔教導之俾性之所近不至爲淺陋迂拘者所誤則學底於成乃能用世而不爲世所用此學焉而後入政其舉動必不同乎俗吏所由來者漸矣予於前清光緒三十三四年間執教鞭於山西法政專門學堂識石君蓋年於同學見其厚重寡文孜孜勤學不尙虛華殆長於德行政事者流而文學語言非其所好器識宏遠可謂樸誠之士也然徒學未見諸設施雖信焉亦不敢必其操刀使割便可有恃而無恐迨至民國改建晉省以地利民風之優異得人治理號稱模範省區試一披覽其政治綱領暨所編輯從政各種要言似多偏重於文學而於實際之措施仍有能言而不能行之弊

苟出宰是邦者照本宣猷斷無良美效果之可言石君治理興縣僻處邊陲才財兩乏尤難坐言起行悉如省令所指導乃觀其就任以來爲時僅及三載其所輯政紀實遷就於省頒法令以內斟酌變通事無不舉語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識見誠有過人者矣然而談政治於今日殊非易事行政樞紐之重心應如何組織方能垂諸久遠社會事業與政治範圍之區分應如何劃分清晰庶能分途並進官民方免權限之爭執是皆於從政之始所當悉心研究不容絲毫或混者也近者號稱良吏求其能於政治之本源了解無遺實所罕見類多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感蓋年是編殆猶不免斯憾矣是爲序丙寅十二月恩施張榮楣序於都門

合河政紀序

嘗謂縣知事一職範圍雖狹而教育司法內務財政農商警察設防詰盜全國之規模略具焉而地方之利弊閭閻之疾苦民事之委曲繁瑣皆當知其底蘊故其肆應有較大吏爲獨難者唐太宗謂縣令尤爲親民則民間之一啼一笑不得委爲不知即廉幹之才不敢謂盡職而無忝也石蓋年大令宰興縣將及三年興縣居萬山之中幅員遼廓村落零星則教令之普及也難石田瘠确沃壤稀疏則地利之興起也難內而民風樸樸安於鑿井耕田之舊習不知與時會相競爭外而濱臨大河時有鄰氛之警告與鴉片之輸入處此僻壤似無一可措手者嘗爲石君竊竊憂之迨其解職後以所編合河政紀見示並索序詳觀其所措施不惟於應興應革諸端向之有名無實者能切實

履行秩然有條理即省長閻公所籌畫利民諸政策於財力兩絀之際力排衆議身爲其難或已辦有成效或尙在試辦之中其限於地勢限於人才非力所能施者亦詳述其實在情形無一言之粉飾而終以倉猝解職未及觀成爲憾吁何其心之壯而志之苦也元起家牧令深知爲邑之難或政本利民利未興而謗已集或志除害馬害未去而怨已叢然決不因謗與怨之故憂疑而事以中輟觀石君政紀一書喜又得一同志焉是爲序民國九年八月泉唐朱善元敬譔於山西財政廳

合河政紀序

昔讀循吏傳穆然想見王成黃霸朱邑龔遂之爲人有清末葉余曾納粟爲縣令聽鼓山左者有年平夙見一班寮友可以稱能吏者有人可以稱老吏者有人可以稱廉吏者亦有人而欲求一所居民福所去見思隱然合循吏身分者卒未得見民國五年時宦游山右收釐金於興縣境之黑峪口興縣地處萬山中其地僻其民嫚吾習聞人言號稱難治乃旣入其境見其田地闢場圃治學校興閭閻安竊心焉異之問之土人乃知握縣篆者爲湖北陽新石蓋年大令也夫興縣一僻縣耳而疆域面積占一萬八千餘方里東界岢嵐南界方山臨縣北界保德西界陝西之葭縣神木村莊寥廓稀若晨星百戶之村不過三四而三五人家築土屋於山環水曲自爲村落者比比皆是半皆